

● 中国文学

试析宋诗的书卷气

龙 珍 华

(湖北教育学院, 湖北武汉 430205)

[作者简介] 龙珍华(1968-), 女, 湖北崇阳人, 湖北教育学院高级讲师, 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 主要从事古典文学和文艺学研究。

[摘 要] 唐宋诗之争由来已久, 诗论家对宋诗的评价历来不一。由于宋人狂热的读书风气、文化上的集大成意识, 宋代诗歌表现出内容上高度文人化、创作上高度技巧化——尤其是大量用典的倾向, 这使宋诗散发出浓郁的书卷气, 具有区别于唐诗的独特气质和神韵。

[关键词] 宋诗; 书卷气; 文人化; 用典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5)06-0779-05

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 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较之唐诗, 宋诗更注重理趣, 表现了诗人从自然、社会的外在兴象转向内在人生理念世界的开掘。在繁荣兴盛的宋代文化氛围中, 宋诗在唐人遗风中变革自立, 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而宋朝特定的社会思想文化背景, 又将宋代诗歌烙上了深深的印记, 其中之一就是其博奥典雅性增强了, 诗的意蕴和趣味更加文人化, 诗的学问气、书卷气更加浓厚了。

一、高度文人化的宋代诗歌内容

宋诗的书卷气首先表现在诗歌内容上的高度文人化。作诗虽不是文人的专利, 但在宋代, 诗歌却是文人士大夫使用频率最高的文体。据张鸣先生《宋诗选·前言》中所统计的数字, 在新编《全宋诗》中, 收录的宋代诗人不下9 000人, 诗作达3 785卷。作品和作者数量都大大超过了现存唐诗。从这个庞大的数字, 我们可以看出诗歌这种文体在宋代文人士大夫中的普及程度, 以及在其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在宋诗中, 表现文人精神文化生活内容的诗歌数量很大, 诗歌内容文人化倾向很明显, 属于文人士大夫阶层而难以为世俗民众所理解和欣赏的成分增多了。诸如闲居野处、送往迎来、唱和赠答、谈禅论道、考证名物、品茶赏花, 以及关于读书心得、书画鉴赏、题画题墨、评诗论艺、辩论学术、咏史怀古等内容, 这种文人士大夫的诗歌, 往往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丰富地表现了文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这种文人化的诗歌内容, 赋予宋诗明显的书卷气。

如王禹偁的《泛吴松江》:

茅蓬疏薄漏斜阳, 半日孤吟未过江。唯有鹭鸶知我意, 时时翘足对船窗。^[1](第695页)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泛舟吴松江上的雅趣。在古代文人的笔下, 鹭鸶孤高纯洁而无俗世心机, 宋人陈岩肖《庚溪诗话》说:“众禽中惟鹤标致高逸, 其次鹭亦闲野不俗。”欧阳修《鹭鸶》绝句也说:“(鹭鸶)风格孤高尘外物, 性情闲暇水边身。”^[1](第3687页)在宋诗中这种表现文人心性修养的作品很多。“鹭鸶”意象的背后隐藏着丰富的文化信息, 这是一种学问, 当然也是书卷气的表现。

张毅先生认为, 宋人所谓学问, 不只是对外在客观世界的科学认识和知识的积累, 更重要的是对主体内在真常心性的体认和反省。“学问之道实乃如何安身立命(儒)、或顿悟解脱(佛、道)的做人之道, 追求的是治心养气时主体自身的内在超越。”^[2](第8页)所以, 宋代诗人的创作注重表现对人生和艺术的体验和感悟。这样, 诗歌与其他艺术形式的界限就可打破——比如苏轼的“诗画本一律, 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1](第9395页), 欧阳修的“古

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盘车图》)^[1](第3637页)。当时文人倡导的写意山水画创作原则,即画意不画形,重意趣而轻形似,和宋诗有异曲同工之妙。诗人展现了高度的艺术鉴赏力,蕴藉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题诗题画这等斯文之事既是文人精神生活情趣的体现,又是文人学识才华的展示,如苏轼的《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虔州八境图八首》、《孤山二咏》、《虎跑泉》;黄庭坚的《题竹石牧牛》、《蚊蝶图》、《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会心,为之作咏》等等,均是文人骚墨。

其实,正如张鸣先生所言,诗歌对于宋人来说,不仅仅是抒发情志的工具,还是“当时文人身分认同的重要手段”,“作诗实际上是具有文化修养的证明”^[3](第7-8页)。欧阳修《六一诗话》载:“吕文穆公未第时,薄游一县,胡大监旦方随其父宰是邑,遇吕甚薄。客有誉吕曰:‘吕君工于诗,宜少加礼。’”^[4](第251页)《梅圣俞墓志铭》中又说:“其(指梅圣俞)家世颇能诗……至圣俞遂以诗闻。自武夫、贵戚、童儿、野叟,皆能道其名字,虽妄愚人不能知其诗义者,直曰:‘此世所贵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5](第235页)

宋人对诗才很是看重,这其实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文化修养和文人身分的器重。宋代诗人往往一身兼具政治家、诗人、思想家等多重身分,除了诗歌,往往还有经史著作,书画创作,通音律,晓五声,多才多艺。这样,文人在诗歌中就会有意无意地“卖弄”学识才华,特别是在宋代诗人之间的唱和赠答之作中,尤其突出。如黄庭坚《次韵宋懋宗三月十四日到西池都人盛观翰林公出遨》:

金狨系马晓莺边,不比春江水上船。人语车声喧法曲,花光楼影倒晴天。

人间化鹤三千岁,海上看羊十九年。还做遨头惊俗眼,风流文物属苏仙。^[11](第11379页)

这首誉人诗歌不落俗套,读来有惊世骇俗之感。颈联化用《神仙传》中苏耽成仙后化鹤回郡楼的故事,又引《汉书·苏武传》苏武牧羊的史实,两个比喻,使苏耽、苏武超凡脱俗的精神人格形象呼之欲出,令人肃然而仰视。这首诗实为纯粹的文人之诗。

品茶赏花是文人生活的重要内容,所以宋代品茶诗很多,苏轼的《和钱安道寄惠建茶》是其中著名的一首,诗人用不同的历史人物性格来比拟不同的茶味:

……

雪花雨脚何足道,啜过始知真味永。

纵复苦硬终可录,汲黯少戇宽饶猛。

草茶无赖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顽犷。

体轻虽复强浮沉,性滞偏工呕酸冷。

其间绝品岂不佳,张禹纵贤非骨鲠。^[11](第9192页)

建安茶是福建名茶,宋人宋子安《东溪试茶录》中有“建安茶品甲于天下”的说法,据说最上品的龙凤团茶,一斤售价要黄金二两。汲黯为西汉濮阳(今濮阳西南)人,汉武帝时曾任东海太守,继而为主爵都尉。《史记·汲郑列传》说其“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曾使武帝怒而罢朝,气冲冲地对左右说:“甚矣,汲黯之戆也!”^[6](第3106页)盖宽饶为河南人,汉宣帝时任司隶校尉,《汉书》七十七卷载:“(盖宽饶)为人刚直高节,志在奉公。”因“好言事刺讥,奸犯上意”^[7](第3245、3246页),谏大夫郑昌曾上书赞颂宽饶说:“臣闻山有猛兽,藜藿为之不采;国有忠臣,奸邪为之不起。……”但“上不听,遂下宽饶吏”。宽饶不辱,“引佩刀自刭北阙下”^[7](第3247、3248页)。

汲黯、宽饶都是汉代刚直勇猛的正儒,诗人用以形容建安茶的好。草茶为散茶,诗人谓之“无赖空有名”,其间绝品虽佳,但却似汉臣张禹——其为人世故圆滑,汉成帝对他颇为敬重,虽“贤”却“非骨鲠”。与其说诗人是在用历史人物比喻茶味,还不如说诗人是在借茶味而褒扬“戇”“猛”之士,贬斥“妖”“顽”之辈。其间嬉笑怒骂的妙意,令人好生回味,似品建安茗。

宋朝大量的茶诗既丰富了中国古代的茶文化,无疑也增强了宋诗的书卷气。这些诗歌典故背后蕴涵着丰富的文化气息,也体现了诗人高度的创作技巧,单从用典的角度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书卷气。

二、大量用典——宋诗书卷气的集中体现

宋诗之书卷气,一方面表现在诗歌内容上,另一方面还体现在诗歌的表现手段和技巧上。大量用典,“以才学为诗”,成为宋诗书卷气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宋人对创作技巧的这种追求自西昆派已经开始。

欧阳修《六一诗话》云:

杨大年与钱刘歆公唱和,白《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石先生老辈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

晓,殊不知自是学者之弊。如子仪《新蝉》云:‘风来玉宇鸟先转,露下金茎鹤未知。’虽用故事,何害为佳句也。又如峭帆横渡官桥柳,叠鼓惊飞海岸鸥。’其不用故事,又岂不佳乎?盖其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而不可,非如前世号诗人者,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为许洞所困者也。^[4](第252页)

欧阳修认为,西昆诗人爱“多用故事”,却也能因此而“为佳句”的一个重要原因,“盖其雄文博学,笔力有余”罢了。西昆诗人力效李商隐,好大量用典,杨亿在《西昆酬唱集序》中就声称:“历览余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宋诗的书卷气自宋初“西昆体”便已有了初步规模。方回《瀛奎律髓》卷三评钱惟演《始皇》诗时也说“此昆体诗一变,亦足以革当时风花雪月、小巧呻吟之病。非才高学博,未易到此。”方回所言,说明西昆诗人已很注意才学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迈开了“以才学为诗”的第一步。

但西昆诗有很多还不能算真正的用典,比如有些咏史怀古之作,其题材本身就不能算用典。而有些用典还只是无个性的模仿,或者说用典的艺术技巧还不高,如杨亿的《泪二首》其一:

锦字梭停掩夜机,白头吟苦怨新知。谁闻陇水回肠后,更听巴猿拭袂时。

汉殿微凉金屋闭,魏宫清晓玉壶欹。多情不待悲秋气,只是伤春鬓已丝。^[1](第1405页)

此诗显然是模仿李商隐《泪》诗的用典方式,抒伤春旧感,虽写得典雅雅致,却无义山《泪》诗末句的气势,因而未获好评。

杨亿用典虽然还没有脱去旧痕,但可以说已将宋诗好大量用典的风气吹起了第一口气。以后欧阳修、梅尧臣领导的诗文革新,尽管力求诗歌的自然平淡,却还是沿袭了“以学问为诗”、以典故入诗的宋初诗风,崇学尚典,譬如欧阳修就爱化用古人诗句,王安石也喜以史料入诗。至苏黄时期,用典之风,已被推向巅峰,几臻完美,技巧也更加娴熟,如苏轼《刘贡父见余歌词数首,以诗见戏,聊次其韵》:

十载飘然未可期,那堪重作看花诗。门前恶语谁传去,醉后狂歌自不知。

刺舌君公犹未戒,炙眉吾亦更何辞?相从痛饮无余事,正是春容最好时。^[1](第9218页)

这是苏轼所涉“乌台诗案”的诗歌,几乎句句用典,卓显用典功力。尤其是引《隋书·贺若弼传》“引锥刺舌”,以及《晋书·郭舒传》“扞鼻”、“炙眉”的典故写成,颂扬刘贡父与自己直言敢议(苏在杭州时常与他直议新法时弊)的可贵品格,同时又暗示刘与自己要小心谨慎些,以免惹祸落得郭舒的下场。作者把隐含在复杂背景后的意思用两个典故简明准确地表达出来了。

黄庭坚是公认的最能突出表现宋诗“以才学为诗”特征的诗人之一,其诗歌多取材于书本,很少有不用典的。好用典也常常成为他的诗歌受到批评指责的一个重要原因。黄庭坚《山谷集》卷十九《答洪驹父书》中说:“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他力效杜甫,主张多读前人的作品,创作时或师承前人之辞、或师承前人之意,“以故为新”,并力求打破“有意于为诗”的技巧束缚,从而进入他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的艺术境界。

尤其在诗歌题材的处理上,山谷诗着重于挖掘自己的内在精神世界,如《赣上食莲有感》:

莲实大如指,分甘念母慈。共房头臄臄,更深兄弟思。

实中有么荷,拳如小儿手。令我念众雏,迎门索梨枣。

莲心正自苦,食苦何能甘?甘餐恐腊毒,素食则怀惭。

莲生淤泥中,不与泥同调。食莲谁不甘?知味良独少。

吾家双井塘,十里秋风香。安得同袍子,归制芙蓉裳。^[1](第11332页)

这首诗是诗人担任吉州太和知县(今江西泰和)期间,因事经过虔州(赣上)时所作,几乎句句都有出处。比如“分甘”句语出《晋书》所录王羲之《与万谢书》:“……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写慈母胸怀;“共房”句语出张籍《采莲曲》:“青房圆实齐臄臄。”——喻手足深情;“实中”四句意出杜甫《彭衙行》:“众雏烂睡暖,唤起露盘殍。”——书纯真稚趣;“甘餐恐腊毒”语出《国语·周语》:“高位实疾颠,厚味实腊毒。”——喻人处高位应当自节自律;“素食”句语出《诗经·魏风·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写为官品德;“莲生”二句,系参照《大正藏》卷十四《维摩诘经·佛道品》“高原陆地,不生莲华,卑湿淤泥,乃生此花”的语意而出——赞莲花品质的高洁;“食莲”、“知味”二句语意出自《礼记·中庸》:“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说人们不能真正识得莲味;“安得同袍子”语出《诗经·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句,“归制芙蓉裳”系化屈原《离骚》“集芙蓉以为裳”句意。最后两句寓意深远,表达了诗人以美德修身的心愿。

诗人化用丰富的典故,展示了广博的才学和精到的诗歌创作技巧,自然抒发了母子、兄弟间的人伦亲情,并发出立身处世的感慨和超身脱俗的心意,致“思”极“幽渺”。此诗读来很是令人感动,汪蕤《诗论》卷下评论说:“山谷《食莲》诗,比体入妙……风人之致,偶然远矣。”

三、宋诗书卷气的形成原因

大量用典使宋诗的书卷气增强了。南北朝历来被指用典太甚,但也只是作赋时好用典,作诗用典还不算太多。唐代杜甫、韩愈、李商隐用典相对较多,但也比不上宋代诗人的用典成风。

究竟什么是“用典”,刘勰《文心雕龙》的诠释为“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现代汉语词典》对“典故”是这样解释的:“诗文里引用的古书中的故事或词句。”^[8](第280页)对于用典的界定,我们可以按照这两个解释去进行,即引用前人著中的故事或词句进行“类义”或“证今”,就是用典。对于古人的作品,我们今人去衡量他们是否用典,在界定上也许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由于时代文化背景的变迁,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很常见的“故事或词句”,在我们今人看来可能就成了生僻的典故了。所以说用典还存在着时代和个体认知的差异性。这里所谈的主要是指其广义意义上的用典,即作者是否化用古书中的故事或词句。

宋诗用典甚多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宋人才学的广博,同时,因为诗人在用典过程中广泛地传承了前人的陈辞旧意,必然也丰富了诗歌的语言资源,使宋诗语言更加书面化了。同时,“由于曲子词的发展,诗歌的音乐功能已经被曲子词替代,宋诗已经完全脱离了音乐,基本上是徒诗,不再入乐歌唱,宋诗的传播和接受主要靠书面阅读。”^[3](第7页)宋代诗歌已经成了完完全全的书面案头文学,其诗歌语言更趋书面化,也是必然的结果。因此,宋诗的书卷气也表现在诗歌的语言上。

书卷之气来源于读书和学问。无论是诗歌语言运用上的更加书面化,诗歌题材内容的人文化,还是诗歌表现手段和创作方法上的高度技巧化,“以才学为诗”,崇学尚典,都与当时的社会思想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与宋人的读书风气密切相关。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太祖赵匡胤生性寡言,然“独喜观书”。建宋以后,开国之初就采取偃武修文政策,倡导文教,宰相“赵普初以吏道闻,寡学术”,使赵宋王朝错用“伪蜀王衍”的“乾德”年号,宋太祖惊怒之余,更是发出“宰相须用读书人”的感叹,并常劝赵普读书,“普遂手不释卷”^[9](第171页)。

《宋史·文苑传序》说,自宋太祖“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及其即位,弥文日增。”此后宋帝重文轻武的传统,代代相袭,以至“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而“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尹,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10](第12997页)。

因此,赵宋朝野内外,弥漫着尚文典学的风气。朱熹曾有微言:“太宗每日看《太平广记》数卷,若能推此心去讲学,那里得来,不过写字作诗,君臣之间如此度日而已。”^[11](第569页)

与科举取士相应的宋代教育规模的扩大,从中央到地方大力扩办官学,民办书院、私塾也大为兴盛,又为平民百姓增加了入学读书的机会。文治之功,莫大于造就了有宋一代满朝文韬武略的人才。为选拔合适的人才,宋朝科举“取士不问家世”,甚至惟恐科举还不能尽罗天下奇才,又进行不拘一格的选拔和任用。这无疑会大大激发文人士子进取功名富贵的狂热理想。

同时,宋代印刷出版事业的繁荣,写本文献向刻本的转化,也带来了宋代校勘学的发达,扩展了宋人读书的兴趣。官刻、家刻、坊刻三大刻书系统,将经史子集、佛经道藏等书籍大量刊印出版。书量的增多,为文人士子提供了读书的便利,使宋人读书拥有了千古难逢的契机。当时名目繁多的报纸,如《朝报》、《内探》、《省探》、《衙探》等等,不仅大大活跃了宋人的文化生活,而且为宋代文人创造了博古通今的条件。

因此,由于统治者对文化事业的重视,激发了宋人狂热的读书激情。柳永《劝学文》说:“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范仲淹就是一位苦读之士。欧阳修在《范公神道碑铭》中记叙范仲淹少年读书的情况说:“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经之旨。”^[5](第144页)在有宋一代,不论是文学大师、理学诸子还是名臣贤相,其笃志进取、嗜书如狂的事迹不胜枚举。读书使他们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文化修养渊博的一代文人。正如汪洙《劝学诗》所言:“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读书治学对宋代士大夫来说,既是入仕必经之途,又是人格完善的重要途径。宋人读书之多,读书风气之浓厚,远远超过了历代,故表现文人读书生活的诗歌也大大增多了。凡与文人生活相关的事物诸如笔、墨、纸、砚等文房四宝,或文人的文化活动的产物如书画作品等等,都受到诗人的青睐。读书多所带来的知识学问之积累也必然丰厚,因其“雄文博学,笔力有余”,那么在诗歌创作过程中的大量用典,就是“无施而不可”的事情了。

另一方面,伴随这股从中央到地方读书热的,还有北宋庆历年间出现的疑古经思思潮所带来的文学思想观念的演变。由于宋朝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儒释道三家思想在矛盾斗争中渐渐互相渗透,出现了文学思想上兼蓄包容的倾向,文学观念上的泛化,以及文学艺术创作上的集大成意识。这种集大成意识对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陈师道《后山诗话》云:“苏子瞻曰:子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书,皆集大成者也。”^[4](第281页)所谓“集大成”实际上也包含以复古为创新的意思,即对文学艺术进行继承地发展,正如秦观《淮海集》卷二十三《韩愈论》中赞韩愈所言:“钩列庄之微,挟苏张之辨,班马之实,猎屈宋之英,本之以诗书,折之以孔氏。”宋人要学韩愈出入经史百家,集文史哲各类文体之长为一体,“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便顺理成章。这种文体之集大成来自于文化上的集大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出现“以才学为诗”的现象也在所难免,它实际上体现的就是这种文化集大成意识,这种集大成有赖于学问的积累,有赖于大量的阅读。故读书与写诗在宋人看来,二者存在必然联系。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七黄庭坚明确强调:“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竹庄诗话》载苏轼“尝谓钱济明云:‘凡读书可为诗材者,但置一册录之,亦诗家一助。’”所以,他们都主张出入于前人的经史成辞中去“换骨”、“夺胎”,“资书以为诗”。苏、黄之诗用典范围之广,自经史而外,稗官野史,道藏释典,医书农书等等,无不涉及。

对于宋诗的书卷气,我们应该给予客观的评价。

一方面,我们不能否定,宋诗书卷气太浓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阅读上的理解难度,正所谓“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书卷之气使宋诗具有了一种独特的审美气质和神韵,似翰墨书香,留芳千古。虽然贬宋诗者认为宋代诗歌已经脱离了唐诗的感性色彩,诗歌的审美特质减少了,然而宋人的大量读书生活,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文化背景折射下,给宋诗带来的浓厚书卷气,却成为了宋诗区别于唐诗的一个重要标志,成为了宋诗的一大特色。

[参 考 文 献]

- [1]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全宋诗[Z].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 [2] 张 毅. 宋代文学思想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 [3] 张 鸣. 宋诗选[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 [4] 纪 昀, 等.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集部四一七[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5] 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 上[M]. 北京: 北京市中国书店, 1986.
- [6]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7] 班 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9] 李 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10] 脱 脱, 等.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11] 朱 熹. 朱子语类[A]. 朱子诸子语类: 第35卷本朝一[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责任编辑 何坤翁)

Song Dynasty Poetry: Pedantic Quality

LONG Zhen-hua

(Hube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Wuhan 430205, Hubei, China)

Biography: LONG Zhen-hua (1968-), female, Lecturer, Hube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majoring in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Abstract: The appraisal on the poetry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has long been divergent with critics holding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Song poetry. Most poets in the Song Dynasty were book maniac and had strong sense of agglomeration, thus resulting in the highly pedantic quality in content and writing skill of poems, especially the extravagant adoption of idioms. The scholastic property of the Song poetry distinguishes itself from that of the Tang Dynasty with its special charm.

Key words: poetry of the Song Dynasty; pedantic; scholastic; adoption of idioms